

鲁迅——人民教师的光辉典范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教育方面，也同样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 1909 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绍兴师范学堂等校任教。到北京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公中学、中国大学等八所学校兼课。后来由于军阀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南方，由厦门到广东，仍然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教授的课程有生理学、化学、博物学、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等。1927 年到上海以后，虽然没有在学校正式担任教职，但他曾多次到上海的劳动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继续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

鲁迅从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造就革命的新人。他认为，这种新人应该是“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为了达到培育新人的目的，鲁迅总是将革命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斗争中成长，在成长中战斗。他谆谆告诫学生千万不要成为“书呆子”和“书厨”，以致迷失方向。鲁迅不

仅给青年指明斗争的方向，还教育青年掌握斗争策略和方法。要他们分清敌、友、我，注意保存自己，团结朋友，打击敌人，多采取“壕堑战”，以极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战果。

当有的青年学生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斗争任务艰苦或疾病缠身而苦闷徬徨的时候，鲁迅总是激励他们的斗争意志，帮助他们认清革命的前途。他说：“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记谈话》）“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致韦素园信》）

每当反动派压迫残害革命青年学生的时候，他总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起而抗争，奔走营救。不论“女师大风潮”，还是广州“四·一五”前后的风风雨雨，他始终和革命的师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表现出他革命的硬骨头精神和在政治上对学生的极大关怀。

鲁迅在课堂教学中也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因为“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他教小说史时，总是向学生“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他以为单是讲小说史，即使教的烂熟，对于社会的改革上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他是要通过小说史的讲课，培养些能够用笔向旧社会进攻的人。”（许钦文《跟鲁迅先生学小说》）

作为一个革命的教师，鲁迅在教学中认真严肃，很注意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教给他们从事革命的本领。他在绍兴中学堂教生物学时经常到野外去采集植物，自作标本，通过直观教具使学生更快地掌握科学知识。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小说史时，为了查阅资料，他跑遍了北京一些有名的图书

馆，亲手抄写资料。许寿裳回忆说：“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们所信服。”（《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懂得，作为一个教师，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要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认真钻研专业知识，努力搞好科研。因此，鲁迅一贯重视科研工作。他在杭州、绍兴教书时，经常用小纸条抄录中国古代小说的资料，并分门别类加以整理。这些纸条估计至少有六千多张，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一千多张。这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刻苦的学习精神和严肃的治学态度。

鲁迅无论在哪里，始终是勤奋学习，艰苦地进行科学研究，并把科学研究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既是授课的教材，也是科研的硕果。

鲁迅在教学领域里，敢于革命，敢于创新，决不墨守成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被封建文人视为淫书、闲书，受到歧视，以至中国小说一向无史。鲁迅从大量的材料中，对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了小说创作的经验和发展规律，并写成讲义，使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入大学讲坛。这确实是前无古人，后后来者。

由于鲁迅勤奋好学，深入研究，所以他的授课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这两门课程，同时还要兼国学院研究教授。据他的学生回忆：“本来在文科教室里，除了十来个学生之外，老是冷冷清清的；可是从鲁迅先生来校讲课之后，钟声一响，教室

里就挤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站着听了，教室里非但有各科学学生来听讲，甚至助教和校外报馆记者也来听讲了。”

（陈敦仁《忆鲁迅先生在闽南》）鲁迅在书信中也说到当时的情况：“此地学生似尚佳”，“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两地书》）至于他在北京女师大授课的情况，许广平同志回忆说：“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没有一个人逃学，也没有一个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一致拥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欣慰的纪念》）鲁迅的课堂教学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质朴而生动的语言，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的丰富多彩。”（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鲁迅以高度的负责精神做好课堂教学工作，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在课余的时间里多方面帮助青年学生提高业务水平。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读死书，而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还劝告青年“不但要读中国的好书，也要读外国的好书。并且科学书籍也要多浏览，不要仅仅抱住目下流行的时髦书。”“必须要懂得多种外国语，多学会几种更好。”（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鲁迅在课余的时间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娱乐，给青年学生修改文稿，校对，介绍出版，接待来访，回答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碰到的种种问题。凡青年学生有什么要求，只要他能办到的总是尽力而为。正如他在厦门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中所说：“我们……想努力写一点东西，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并且希望他支持我们，他毫不踌躇地满口答应：

‘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鲁迅先生这种最直爽的、最热情的、最亲切的帮助青年的态度，怎么不令人感动！他是我们真正的文学导师，又好象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鲁迅曾说过：“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

（《致杨霁云信》）他还说：“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致张廷谦信》）许多青年在鲁迅的教育帮助下走向革命的道路，有的成为革命的作家。

鲁迅多次谈到，中国的工农大众，深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又加繁难的方块汉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非常重视工农子弟上学，培养工农出身的人材。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时，厦门大学学生会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招收的学生是校中工农的子女及附近农村穷人的子弟。当这个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鲁迅先生还在忙着写作，他却从百忙中，应邀到会演说。他说：“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李淑美《鲁迅支持厦大平民学校》）表现了鲁迅对工农子弟的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

鲁迅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青年学生。他关心学生的健康。他的学生韦素园患肺结核住疗养院，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到疗养院去看望韦素园。有的学生学费有困难，他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资助他们。他的学生董秋芳当时在北大上学，没有学费，鲁迅予以垫付。李霁野学费有困难，鲁迅主动给予帮助，李很感不安。鲁迅写信通过韦素园劝慰他说：

“霁野学费的事，就这样办理。这是我先说的，何必客气。我并非‘从井救人’，的仁人，决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正不必不安于心。”（《致韦素园信》）有的学生离开学校寻找职业没有路费，鲁迅给予帮助。如韦素园离开北京到开封做翻译工作，鲁迅借给他40元川资。有的学生考人大学没有保人，鲁迅出面作保。有的学生没有职业，他积极设法为其寻找职业。学生就业了，鲁迅仍然关心着他们。1924年7月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的邀请，长途跋涉到西安去讲学，他在百忙中接待了北大已毕业的学生王儒卿等人的来访。鲁迅“详问了他现实的工作，生活情况，回不回家等等，处处显示着关怀备至的亲切，使他感到鲁迅处处都在教育青年，时时在热爱青年。”（单演义《鲁迅来西安讲学前后》）

总之，鲁迅对学生政治上的帮助，业务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真正做到对学生全面负责。因此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热爱。

鲁迅就是这样，不图名，不图利，“并没有略有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两地书》），“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致曹白信》）。他象一个辛勤的园丁，以自己的心血浇灌这些可

的革命幼苗。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为青年学生的成长，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鲁迅热爱教育工作，尊重教师的劳动。他认为对教师“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且“还要给以相当的尊重。”鲁迅对他的老师藤野先生的尊敬与热爱就是生动的例子。

藤野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的“解剖学”教师，是一位品格高尚，无民族偏见的日本进步学者。他和鲁迅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离开仙台的前几天，藤野先生又把他找到家里，交给他一张照片，在照片的后面，写着“惜别”两个字。鲁迅与他的老师离别了20年之后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鲁迅在他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里写道：“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藤野先生高尚的精神品质成为激励鲁迅进行战斗的巨大力量。

鲁迅所以如此尊敬和纪念他的老师，因为优秀的教师是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为革命培养人材的主要力量。为了给革命事业“造出大群的新战士”，需要千千万万个优秀教师。

师生 · 战友 · 伴侣

——读《两地书》

1925年3月，北洋军阀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倒行逆施，北京的上空暂时笼罩着浓重的乌云。在新思潮的激荡下，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许广平向她敬爱的老师鲁迅先生写信请教，向他陈述“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请求鲁迅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①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两地书”就这样开始了。

在当时不少的青年学生中，尽管有可贵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对黑暗的旧社会，对罪恶的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还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些青年学生只感受到学校的黑暗、教育当局的反动，一心一意想改革教育。当时，由于广大学生和进步教师们的斗争，章士钊被迫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由屈映光继任。天真烂漫的青年们为此奔走相告，喜庆自己的胜利。鲁迅以敏锐的眼光看到这一危险倾向。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指出屈映光“与‘士钊，盖伯仲之间或且不及。所以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事实上学校与教育当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教育的改革必须有社会之助力，社会若得不到根本的改革，教育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改革的，因为“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鲁迅认

为“旧社会根柢是非常坚固的”，而且它还有“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②面对着当时的现实状况，鲁迅主张对旧社会的进攻必须用“壕堑战”。许广平给鲁迅主编的《莽原》写稿，她想用真名发表。她认为那是“敢作敢当”，鲁迅则认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是不值得的，就给许广平改用了她曾用过的笔名“非心”发表了。鲁迅自己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他是怎样用了“壕堑战”法。这种战法，无疑收到了很好地保存自己，有力地打击敌人的战斗效果。鲁迅很不赞成许褚式的那种“赤臂上阵”的战法，认为那是“有勇无谋”。他也不赞成子路“结缨而死”的作法，认为他“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当然，他也不会同意许广平在来信中提出的主张，“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认为，此法“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这是因为“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弄不好还是革命者吃亏”。

鲁迅认为，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除必须要“立足实力”以外，还必须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必须坚持长期的艰苦奋斗，在这个问题上性急是不行的。当时许广平作为一个激进的青年，有时想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快一时之意”，有时又觉得茫然无所适从，感到“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她这苦闷的原因，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是在“性急”。鲁迅谆谆告诫许广平等进步青

年：“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坏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他提醒说：“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这些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

鲁迅，作为青年的导师，他不仅帮助青年认识旧社会的反动本质，帮助青年们懂得斗争的策略，同时在学业上严格要求他们，使青年们尽快地掌握对敌斗争的武器。

当时一些文学青年喜欢作一些“花呀”、“爱呀”的诗，也有的热衷呼喊些“死呀”、“血呀”的标语口号，鲁迅热切地希望许广平不要空洞的叫喊或做些无病呻吟的文字，要切切实实地写些“文明批评”或“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当然，写好“文明批评”或“社会批评”也不容易，它不仅要求作者有深刻的观察力，还要求高度的概括力，同时它还要有文采，要有含蓄性和形象性。鲁迅看过许广平的文章，感到“却还太直白”，距上述这些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鲁迅还告诫许广平写文章要量体裁衣，要善于根据文章的内容选取适当的体裁。他指出，许广平写的“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但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他说：“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当时一些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写文章喜欢抒情，多用些好

看的字眼，多讲风景，多怀家庭，多情善感，真是“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她们写辩论文章又喜欢作长文，往往是将对手之语，从头到尾，逐一驳去，这种写法，“虽然犀利，而不沉重”，“只有小毒而无剧毒”。鲁迅不论是和“甲寅派”、“学衡派”的斗争中，还是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形形色色走狗文人的斗争中，总是“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充分发挥论辩文章的战斗效能。

鲁迅，作为进步青年的导师，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他总是站在进步青年一边，支持他们的斗争。他抗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为青年们呼号抗争。1925年6月许广平写了一篇社会批评，寄给《莽原》，鲁迅看过以后给许广平回信说，她那篇文章以不发表为宜，因为“这类题目，其实，在现在，是只能我做的，因为大概要受攻击。”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来保护青年的。

鲁迅在政治上是如此热切地关怀、爱护许广平，在写作上是如此热情地指导她，培养她。而许广平也是十分尊敬、爱戴鲁迅的。从《两地书》中可以看出，许广平是出自对鲁迅的极大信任和尊敬，才冒昧写信给老师，倾诉自己的苦衷，大胆地提出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地交往，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由师生、战友，发展为终生的伴侣。远大的革命目标，共同的革命事业象磁石一样将他们吸引在一起。

许广平从1925年3月11日与鲁迅通第一封信开始，到

1926年7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50多封信彼此了解，建立了爱情。但是，他们的爱情刚建立不久，由于北方政治环境的险恶和南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吸引，他们不得不离开故都，同车南行，鲁迅赴厦门，许广平赴广东。他们约好：努力工作两年再见面。鲁迅到厦大以后，担任文科教授兼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还要编写讲义，给学校季刊及国学院季刊写文章，工作十分繁忙。生活条件也非常差，住在国学院三层楼上陈列室里，需走96个石阶才能上去，饭里有小沙，开水经常喝不上，鲁迅不得不进行自炊。许广平在广州任女师训育主任，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十分繁忙，右派学生经常闹事，生活条件也不好，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里，连个窗户都没有，学校经常欠薪。他们在五个月的时间，通信七、八十封。他们在艰难的革命征途上，互相鼓舞，互相关怀，互相支持。鲁迅除授课外还编写了《华盖集续编》、《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还写了部分回忆性散文、历史小说和杂文。许广平在授课、训育等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们彼此分担忧愁，也共享胜利的欢乐。

鲁迅、许广平这对革命的伴侣在生活上也互相关怀。鲁迅在信中对许广平努力工作极表赞赏，但要她注意身体。许广平则在信中说，在上海见到鲁迅用“炒饭下酒，所以也想节约一点”。她说：“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她表示：“于衣，食，抄写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不妨通知，从长讨论。”天气冷了，许广平亲自给鲁迅织了一件绒背心，并与给他从广州刻的一个图章一块寄去。鲁迅接到这两件东西

十分高兴。

鲁迅原计划在厦门大学工作几年，做一番事业，但由于学校当局昏庸不堪，“正人君子”接踵而至，由于革命策源地广州大好形势的吸引，他于1927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担任他的助教。从此，他们俩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为培养革命青年，为中山大学的改革和建设贡献出他们的力量。然而，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成了屠场和牢笼，到处弥漫着血腥气。鲁迅因营救那些可爱的革命青年无效，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于9月27日与许广平一块离开广州赴上海，开始了光辉的十年。

十年里，他们更是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据许广平回忆：“在那时的社会里，鲁迅的确太危险。敌人时时在谋害他，鲁迅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不怕，每次和我一块出门时，总不让我和他一块走在一条人行道上，要我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走，以为如果敌人来杀害了，不要两个人在一块遇难，但是我哪里又肯放心呢？所以还是和他走在一块，以致有时还会引起他对我的不满。”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这对患难夫妻都为了对方的安全宁肯牺牲自己，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多么动人的革命感情！

这对革命伴侣的战斗生活，鲁迅在1934年的12月9日所写《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一诗中曾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这对革命伴侣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促了，1936年10月病魔夺去了鲁迅——这位文化巨人的生命，鲁迅在逝世前所写的遗嘱《死》一文中要许广平：“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事实上，许广平怎么能忘记她的恩师、战友和伴侣呢？她说：“犹如病弱的人曾经输过血的一样，身体是已经渗透了别人的一部分血液，就是想忘记，事实是存在的，终于成为不可能的了。”^④就是鲁迅逝世二十几年以后，每当许广平提笔写纪念鲁迅的文章时，眼泪总是夺眶而出。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保存鲁迅遗稿、书信和藏书，在宣传鲁迅的革命精神，在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等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她经受住了考验，她不愧是鲁迅的学生、战友和伴侣。

注：

①引自《两地书》，以下凡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两地书》。

②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③④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呐喊》《彷徨》比较观

《呐喊》与《彷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品,许多人已讲过许多话,似乎没有再专题论述的必要了。但茅盾先生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他曾经这样下过论断:“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从1918年到1925年),不但表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也表示了他的艺术成熟的阶段。

《祝福》、《伤逝》、《离婚》等篇,所达到的艺术的高峰,我以为是超过了《阿Q正传》的。”^①他的这段话,当然是指艺术成就而言,开始我们有些不理解,怎么《祝福》

《离婚》等篇的艺术高峰会超过《阿Q正传》呢?在思想性方面是否也有不同之处呢?经过学习讨论,我们才慢慢对它有些领会。鲁迅创作的成熟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呐喊》到《彷徨》就反映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这一点,鲁迅本人也有过比较,他认为写作《彷徨》的时候“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②,这表明思想、艺术都有所变化。而且,如果再从鲁迅思想发展和他的创作关系来看,“鲁迅终生都可以说是在探索 and 追求中,要探索出究竟是一种什么的历史的根本力量在促进或阻碍历史的前进”,“他的文学事业”“可以说都是他的这种探索的结果。”^③那么,《彷徨》较《呐喊》,作者的创作思想有何变化,思想艺术有哪些探索和进展,就很值得学习、研究了。

一、《呐喊》《彷徨》思想比较

《呐喊》写于1918年至1922年，出版于1923年；《彷徨》写于1924年至1925年，出版于1926年。出版之前，大部分作品在当时知名的《新青年》、《新潮》、《语丝》、《莽原》、《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从写作、出版的时间上来看，《彷徨》与《呐喊》相衔接，前前后后约七年时间。但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鲁迅留下了时代历史的真实记录，也留下了他思想发展进程的深刻痕迹，在文学史上是研究小说发展不可多得的珍品，在思想史上是研究近代思想的重要文献。

（一）《呐喊》《彷徨》之宏观

《呐喊》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它的价值正如开采出了多年宝蓄的矿藏，蕴含了鲁迅光辉的思想精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鲁迅思想的潜发期。鲁迅对辛亥革命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但狂飙既过，留下了死一般的寂静，老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依旧，“老中国儿女”④的生活依然如故。面对现实，鲁迅暂时沉默了，他继续了他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新的探求。引申开说，他探求什么呢？他不是探求“全人类问题有什么哲学性的思想上的贡献”，而是探求“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旧社会的空前深刻和警辟的解剖；把重重迭迭地压在人民身上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黑暗反动势力加以揭发，反复又反复地向人民和青年加以警告和忠告，他在一生的思想斗争中，积蓄了那么多的战斗经验和教训，形成了他出色的

——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是重要和宝贵的一——战略战术；眼睛看住人民，发现和培养了人民的力量”^⑤等。《呐喊》一书的选材，就是他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探索的反映。

《呐喊》所收的14篇小说，把注意力放在对于旧社会的解剖和农民的命运上。头一篇《狂人日记》异军突起，满怀激情地对“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封建社会进行了宣判，以新的思想和新的姿态投身到新的文坛上，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艺术效果：“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⑥“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⑦，开始了以小说为武器的新的战斗。《阿Q正传》登上了世界文坛的高峰，再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风貌，显示了旧中国农民的地位和出路，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这些成绩决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从日本留学直至回国以来近20年对旧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全部的生活体验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时对新的革命任务的理解，它也包含了多年来鲁迅学习借鉴外国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文学，“要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⑧的思想。所以，《呐喊》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在写作《呐喊》时鲁迅的思想充满了热情，希望用革命的呼喊，“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⑨而且斗争也颇主动，他能自觉服从战斗的需要，与革命采取一致的步调，“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